

Copyright Undertaking

This work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with all rights reserved.

By reading and using the work, the reader understands and agrees to the following terms:

1. The reader will abide by the rules and legal ordinances governing copyright regarding the use of the work.
2. The reader will use the work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nly and not for distribution or further reproduction or any other purpose.
3. The reader agrees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University harmless from and against any loss, damage, cost, liability or expenses arising from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r unauthorized usage.

IMPORTANT

If you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any materials in this work are deemed not suitable to be distributed in this form, or a copyright owner having difficulty with the material being included in our database, please contact lbsys@polyu.edu.hk providing details. The Library will look into your claim and consider taking remedial action upon receipt of the written requests.

口岸知識分子讀書世界的轉易及認知管道的擴充

——以王韜的讀書、譯書活動為中心

The Transfer of Reading World and Cognitive Pipeline of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Based on the Reading and Book Translation Activity of Want Tao

劉容天

LIU Rongtian

香港理工大學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中文及雙語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中國語文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7

中文撮要

口岸知識分子作為最早經歷「西力東漸」浪潮的近代文人群體，其知識轉型、思想變遷的景況近年來廣受學界關注。但不少論者將其思想轉型的原因籠統地歸結為他們獨特的生命經歷，忽略了思想層域之於外在行為的相對獨立性。因此本文將考察重點從口岸知識者的外在「生命史」轉向其內在「閱讀史」，嘗試藉由個體「閱讀經驗」這一內在向度，更好地進入口岸知識分子思想、觀念轉變的歷史現場。

本文通過對口岸知識分子的「閱讀實踐」、「學思歷程」進行清理，發現引發他們觀念轉變的具體「認知管道」主要有三：一即西洋傳教士為傳播基督教所形構的蘊含西方歷史及近代發展成果信息的「知識倉儲」；二為香港早期的現代報業，其大力翻譯西文日報時事訊息的實踐，為口岸知識分子建成了一個簇新的「認知管道」，新知識、新觀念迎面而來，可能引發的思想刺激，不容低估。三為日本「思想資源」，王韜取道日本汲取西方史學知識，遂得以較早接觸「民權」、「自由」等近代價值觀念，面對這一敞開的新知識大門，口岸知識分子最早表達了自己的迎拒態度。

本文除了引言回顧口岸知識社群的形成及其研究現狀外，其餘三章即針對上述三個主要「認知渠道」進行考察：第一章分析傳教士「知識倉儲」中的傳道書籍、中西交涉史書籍、西方歷史書籍對口岸知識分子思想觀點的形塑作用。第二章分析香港早期報業對口岸知識分子資訊視野的拓展及為其提供的新的職業願景。第三章分析日本「思想資源」對口岸知識分子思維世界帶來的全新激盪，在此過程中發生的近代價值與口岸知識者原有觀念的衝突對話，預示了日本「思想資源」將會成為導致中國思想界變遷的一個重要潛在動力來源。

Abstract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were the oldest modern literati groups who experienced the Western Power Spreads to the East. The situa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ought-immigration has been focused by the mass educational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most of critics concluded the reason of the thought-transfer as their unique life experience and they ignored the relevant independence of outer behavior out of the thought level. So the paper would change the observation point from the outer Lif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to the insider reading history. The paper tries to enter into the history spot of the transfer of thought and opinion of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from the individual reading experience such inner dimension.

The paper clarifies from the Reading Practice and Learning Process of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so it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Cognition Pipelines that causes them to change the opinion. First is the Knowledge Warehouse made by western missionary to express the Christianity which has western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harvest in modern; second is the modern newspaper industry in Honk Kong in the early stage; the paper formed a new Cognition Pipeline for the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by translating the current news in western language daily so the new knowledge and new opinion came to them. It may arouse the thought stimulation and i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Third is the Japanese ThoughtResource. Wang Tao went to Japan to absorb the western history knowledge so the Civil Right and Freedom such modern value opinions could be reachable for the intellectuals. Facing with the open door of new knowledge, intellectuals showed their attitude firstly.

In the paper, introduction reviews the forming and study status of group of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and the rest of three chapters will have observation of the three main Cognition Pipeline mentioned above. The first chapter analyses the shaping impact of missionary books, Chinese and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history books and Western history books in the Knowledge Warehouse on the ideological point of view of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ses the exploration of early Hong Kong newspaper industry to the news vision of the group of treaty port intelligentsia and the new vocation future provided by the industry. The third chapter analyses the new surge of Japanese Thought Resource to the thought world of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The modern value happened in the process had conflict conversation with the original opinion of 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 which predicted that Japanese Thought Resource would be the source of important potential motivation of the transfer of Chinese thought circle.

鳴謝

轉眼之間，已近畢業，美好的碩士生活即將畫上句號。在這一年中，能夠學有所得，主要有賴於以下幾位老師的悉心授課：首先是在課堂上認真嚴肅、諄諄教導的彭敦老師，讓我第一次體會到古典文學具有的超越時空限制的人性光華，進而讓我不再受制於「傳統」與「現代性」這兩個簡化的抽象概念；其次是進行半學期「女性主義」專題教學的梁姍姍老師，她教會我同等地尊重當代社會不同社群間差異化的利益訴求，並讓我開始關心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群體，他們的權利得到切實保護的時刻，其實正是整個社會文明水平提高、人權日益覺醒的時刻。此外還有在課堂上苦苦引導同學們思考知識分子如何對接社會的高坤翠老師，高老師所提問題是現代學科原子化之後知識分子必須要面對的困境，對此我雖然沒有思考出對策，但由此打開的宏觀視野卻讓我受益匪淺。

如果可以將致謝範圍擴大，我想感謝這一年來聆聽多次的我校中國文化研究學系主辦的講座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講座，兩岸四地的學者在香港自由溝通、問學對話，讓我感受到香港獨特的活力與魅力。

回歸本篇論文，本文是受張志勤老師悉心指導而寫成，並承蒙惠賜許多寶貴意見，在此深深致謝。選題過程亦承高坤翠老師熱心指教，同樣深表感恩。

研究生的生活是快樂的，希望在畢業之後我的同班同學都能前程似錦，我的老師們事業順利，闔家幸福；也希望我的女朋友能夠順利考試通過，翻開人生新的一頁。

最後的祝福，送給我遠在家鄉的父母，希望他們身體健康、平安和順。

目錄

引言	6
第一章 傳教士「知識倉儲」與口岸知識分子讀書世界的轉易	11
1.1 傳道書閱讀與王韜宗教觀的成型	12
1.2 《華英通商事略》：反思戰爭的「思想資源」	14
1.3 《大英國志》：基本政體問題的掙扎抉擇	18
第二章 早期香港報業與口岸知識分子知識視野的拓展	20
2.1 從儒蓮到張宗良：合作關係及資訊視野的更換	21
2.2 《普法戰紀》、《循環日報》蘊含的新「智識」內容	24
第三章 日本「思想資源」的引入與口岸知識分子的迎拒態度	26
3.1 王韜的「扶桑之遊」及 1870 年代中日思想界的不同水位	27
3.2 「日本經驗」帶來的多重思想激盪	30
總結	35
參考書目	36

引言

1. 口岸知識分子的出現

1842 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中英南京條約》，開放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並割讓香港島為英國殖民地，准許英國人在上述口岸地區定居、貿易和傳教。從此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就開始被迫捲入全球化的自由市場和東西方文明交融碰撞的潮流之中。

與其說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再也無法避免受到西方的影響，不如說此時的中國已經從根本上處於被西方深刻改變的世界之中。1840 年代的世界，既因為西方的「雙元革命」而發生了根本改變¹，又因為先發現代性國家的對外擴張而呈現出文明、文化激烈衝突的特點。在當時的中國，最能體現這種特點的就是以上海為代表的「通商口岸地區」。

這些由西方資本造就的「飛地」，一方面刺激了當地工商業的發展，使得口岸地區逐漸成長為繁榮的大都市；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周邊農村地區自然經濟的解體，都市與鄉村的兩極發展，使不少失去生活來源的農民和一些窮愁潦倒的文化人開始拋棄傳統的謀生手段，離開農村，前往上海、廣州、香港等通商大都市去謀求生路。

這就是王韜所代表的第一代口岸文人遷居口岸城市上海的具體歷史語境。1849 年，王韜的父親因病去世，一家老少三代的生活開銷遂落在了年僅 20 歲的王韜身上。此時，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 (Walter Medhurst, 1796 — 1857) 邀請王韜到上海謀生，擬接替父職，受僱於英國倫敦會所創立的上海「墨海書館」(英文名稱為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協助傳教士翻譯《聖經》。王韜因此時家鄉遭遇水災、民生艱難，於是離家赴滬，開始了長達十三年的「傭書西社」的上海生活，並由此開啟了他此後一生未曾遠離的中西文化交流事業。

¹ 英國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Eric J. Hobsbawm)，曾將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和同時期英國的工業革命合稱為「雙元革命」(dual revolution)，並就「雙元革命」如何改變了歐洲及世界的方方面面而作出了詳細、全面的闡述。詳見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著，王章輝等譯，《革命的年代 1789-1848》(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

1849—1862 年王韜在上海墨海書館擔任中文編輯，參與《聖經》翻譯和西方科技、人文著作的翻譯。1862 年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被清政府通緝，在英國駐滬領事幫助下逃往香港。抵港後開始協助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翻譯儒家經典，中途理雅各因兄長去世返英，邀請王韜遠赴蘇格蘭繼續參加翻譯工作，王韜遂得以在 1867——1870 年漫遊英法等國。1870 年返回香港後，組織中華印務總局，1874 年創辦《循環日報》。1879 年遊歷日本。1884 年回到上海，出任格致書院山長，晚年整理著述，1897 年病逝。

剛剛接到麥都思邀請涉足上海的王韜，一定不會想到自己日後會成為一位被寫入中國思想史的人物，他那時只是因為「飢驅作客」，才不得已忤逆里閭之勸阻，捨棄正士之清譽，無奈接受「日與夷人為伍」的處境。

但是口岸畢竟是一個全新的制度性場域，它不僅為中國落第文人提供了一份報酬優厚的新式職業願景，而且讓這批口岸文人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批和西方人共事、從而對西學有相當瞭解的文人；又因為這批文人大多絕意科場，相對遠離主流話語中心，他們遂得以在「中華世界的邊緣」成長為「晚近中西文學—文化交流最基礎、最龐大同時也是最有影響的主體力量」²

這批新的知識群體處在中西文化思想交匯的第一線，幾乎全部經歷了認知結構、文化意識、心理形態層面上的艱難蛻變。他們的這種個體的生命經驗，在今天多元文化持續激蕩的環境下，越來越顯現出其獨特的重要性，及其不可低估的啟示意義。

2.研究現狀

學界對晚清口岸知識分子的研究起始於對其中代表性人物——王韜的發掘和探討。早在 1930 年代，國內史學界就針對王韜有無上書太平天國，王韜的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跡等進行了一系列的考證與辯論。值此同時，日本學者從另外一個角度，即王韜訪日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進行了相關探索：如佈施知足的《從遊記看中國明治時代的日本往來》（1938 年《東亞研究講座》第 84 輯）、實藤惠秀《王韜的訪日與日本文人》（1941 年《近代日支文化論》）等。

² 段懷清，《傳教士與晚清口岸文人》（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7 年），頁 8。

1956年，國內學人方漢奇發表論文《王韜——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報刊政論家》，論述了王韜在《循環日報》的報業生涯，以及他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先驅地位。其後出現的一系列論文，如忻平的《循環日報》等，繼續對這一問題展開探索，使得國內學界關於王韜的研究脫離了「單純考證」的階段，拓延了這一問題的研究視角——此後有吳雁南的論文《試論王韜的改良主義思想》，從王韜的近代改革思想入手進行專題研究；陳左高的論文《王韜的〈扶桑遊記〉》，針對王韜的文學作品進行評析探討。這時期的論文大體上是介紹性和評點性的，但為之後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礎。

1987年，美國漢學家柯文出版英文研究專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本書首次提出「口岸知識分子」這個群體概念，並從宏大的歷史背景出發，開掘口岸知識分子這個知識社群的思想、實踐意義，作者認為通過研究他們的生命軌跡可以認識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特點。³

1990年4月，國內學術界也迎來了一部「對王韜進行全面研究的開山之作」——忻平的《王韜評傳》，該書全面而詳細地探討了不同時期內王韜思想、實踐的特征，及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1993年出版的張海林的《王韜評傳》，除了全面考察王韜的生平之外，還從政治、經濟、外交、文藝、教育等五個方面介紹了王韜的改革思想。柯文的研究專著及這兩本傳記體研究，奠定了學術界進行王韜研究的基調。

90年代以來，學術界除了出產了上述研究專著之外，還有大量相關研究論文發表。按其研究方向，大體可分為以下四類：

一、將王韜定位為一個提倡變法的先驅者，分析他的近代改革思想：比如對王韜的經濟改革思想進行探討的，如張廣杰的《王韜商本思想論略》等；對王韜的政治改革思想進行探討的，如謝丹的《〈循環日報〉與王韜的民權思想》等；以及對王韜教育改革思想進行探討的，如黃瀟凱的《王韜教育思想的反傳統性探析》等。

二、王韜作為一位才華橫溢、勇於創新的晚清文人，留下了大量遊記、小

³ 本書的中譯本由雷頤、羅檢秋翻譯並於1998年出版，此後廣為國內學人熟知引用，成為王韜研究及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研究的經典。詳見（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說、詩詞作品，研究者將這一文學面向進行了梳理分析。比如對王韜的小說思想進行研究的，如黨月異的《西學對王韜文言小說的影響》等；對王韜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進行研究的，如楊增和《王韜〈漫遊隨錄〉中的異國女性形象》等。

三、隨著研究的日趨深入，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學者開始普遍關注到：王韜除了是一位近代改革家、文學家以外，還是十九世紀中國較早一位親身經驗近代世界變化與中西文化撞擊的見證者，國內學界開始從這個意義上把王韜定位為口岸知識分子群體的典型，探討王韜對中西文化撞擊做出的回應與思索，如林啟彥的論文《王韜的中西文化觀》等。2003年，王立群出版了這方面的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韜研究》，運用比較文化研究的視角，系統全面地考察了王韜在各個時期參與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動，及其對王韜思想觀念造成的變化。

四、學界對於王韜以外的其他口岸知識分子，如蔣敦復、沈毓桂等也積累了不少個案研究。最早進行這方面嘗試的是熊月之，他在《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開創性地對蔣敦復的民主思想進行梳理，蔣贊頌西方議會制民主，並認為它是我國傳統儒學三代政治在西方的移植。這種以熟識的傳統來比附西洋新知的傾向為我們研究開埠初口岸知識分子的認知特點提供一定借鑒。此後，易惠莉出版的專著《西學東漸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沈毓桂個案研究》，論文《同光年間上海本邑紳士的生活價值取向——以張煥綸為主要考察對象》等對另兩位口岸知識分子代表人物——沈毓桂、張煥綸進行了深入的個案分析，為口岸知識分子研究貢獻出另外幾塊寶貴的陣地。

五、除個案研究之外，關於口岸知識分子的群體文化特征也有研究成果出現，如段懷清的《傳教士與晚清口岸文人》，以晚清來華傳教士的佈道團體為單位，梳理西方傳教士與他們的中國助手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及社會實踐。2016年華東師範大學歐德良的博士學位論文《晚清口岸知識分子的歷史變遷（1842-1900）：以上海為中心》，以口岸知識分子參與的重大歷史事件為綱、以時代變遷為目，將口岸知識分子的思想變遷、社會活動及其歷史貢獻較完整地呈現出來。

3. 研究設想

從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學界對王韜的生平、事業和著作已進行了全面、細緻的分析，其中關於王韜思想的論著亦堪稱豐富，但是以往研究較多選用外部研究的方法，傾向於將王韜的思想主張切割為經濟、政治、教育、外交等幾個互不相干的部分，相對忽略對王韜思想變遷具體情境的考察。而一些嘗試解決這一問題的論著如王立群的《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韜研究》等，卻又容易用大而化之的生命經歷來代替人物內在觀念演變的真實軌跡，忽略了思想層域之於外在行為的相對獨立性。

因此，本文的考察重心將從口岸知識分子的外在行為轉向其內在閱讀世界，從其「生命史」的研究轉向其「閱讀史」的研究。試圖通過對其所讀之書及所獲之資訊進行清理，找到觸發他們思想變遷的具體「知識線索」。希冀藉由個體「讀書經驗」這一內在向度（inner dimension），更好地進入王韜思想、觀念轉變的歷史現場，具體分析新的思維素材對王韜思想造成了怎樣的形塑與刺激作用，並進而為描述口岸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動及知識轉型提供具體而微的例證。

第一章 傳教士「知識倉儲」與口岸知識分子讀書世界的轉易

1846 年，鄉試落第的王韜在家鄉過起了塾師生活。從他這一時期寫給友人的信中可以窺見其讀書旨趣的轉變：「韜摒棄帖括，一志讀書，閱先賢典籍，未得萬中之一，邇年妄懷述作，而牛毛麟角，剖校非易，然或自此得稍益學問」⁴。除了確立「治學為用」的實學取向外，王韜還在讀書範圍上突破了「正統」經籍範圍，有意涉獵野史、小說、雜劇等以廣見聞。在此時期他的「閱讀世界」中還有一本書格外引人關注，即是與《海國圖志》同年出版的「新輿地學」著作《域外叢書》⁵。

該書置諸王韜案頭，成為其閱讀致知甚至熱心推薦的對象⁶，固然能說明其有感於時局變化，已開始對域外地理知識產生興趣；而他初訪上海時所寫的這兩句詩則更直接地表達了這層意涵：「應有重臣鷹管鑰，早來絕域會舟車。土風誰補蠻夷志，波畢今登貨殖書。」⁷其中所謂「會舟車」、「蠻夷志」之言，自然讓人想起當時正方興未艾的「輿地學」著作《舟車所至》、《紅毛番英吉利考略》等。總之，王韜的這種經世精神及其對域外世界的「求知興趣」很可能正是他在家鄉授書難以為繼時，情願接受麥都思聘請的動因；而王韜在日後的回憶中說：「老民欲窺其象緯輿圖諸學，遂住適館授書焉」⁸，應該也非全然虛飾，因為回歸當時嘉道年間「輿地學」的發展情境，期待從西人著述中吸收世界與圖知識確是一種重要潮流。

所以在麥都思「遣使再至」的情況下，王韜遂於 1849 年 10 月正式接受邀請，前往倫敦會上海站為西洋傳教士「傭書」。爾後數載，王韜除了工作內接觸到的基督宗教文化、西方科學著作之外，還主動出入西洋傳道士所創建的西學

⁴ 王韜，〈弢園尺牘〉，輯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〇〇輯·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頁 27。

⁵ 此書為清代王蘊香所編之九卷本域外史志叢書，1842 年由靜觀齋刻印出版，其中名篇汪文泰所作《紅毛番英吉利考略》是鴉片戰爭前後晚清士人了解敵方英國的重要知識窗口之一。

⁶ 王韜在 1846 年寫給友人王紫簾的信中向其推薦此書，並評論該書道：「《域外叢書》備載要荒情俗、光怪陸離、弗嫌於誕，亦海國見聞之一端。」詳見，王韜，〈弢園尺牘〉，輯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〇〇輯·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頁 27-28。

⁷ 王韜，《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52。

⁸ 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文錄新編》（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頁 327。

「知識倉庫」，開展自己有關於「西史」的學思活動。可以說這一時期的「閱讀經歷」對王韜宗教觀、近代世界觀的形成具有明確的線索意義。

1.1 傳道書閱讀與王韜宗教觀的成型

因供職於教會機構，王韜在 1849 至 1853 年間的主要工作就是協助麥都思重譯和修訂「代表本」聖經。與此同時，這幾年間倫敦佈道會上海站下屬的墨海書館也因印刷聖經的繁重作業，較少出版西學著作，所以兩個方面的原因導致王韜滬上傭書之初接觸的域外書籍多是與基督宗教相關的傳道書。

王韜在這一時期除了閱讀、助譯基督宗教文化書籍外，還因一次大病復原的經歷，在 1853 年申請受洗入教。據學者查證，麥都思 1854 年 10 月向倫敦會總部提交的半年工作報告中就附有王韜申請受洗的信函⁹。在這封信函中，王韜不僅寫到自己「信心造就」的歷程，還附帶提出了大量改革基督教在華傳教策略的建議，這些建議很能代表王韜對基督教的認知，撮其要者如下：首先，王韜援引耶穌會士明代傳教之例，建議先爭取士大夫階層認同，而發展耕夫工匠、不學無識之輩作教徒則會妨礙聲譽，令才智之士望而卻步。其次王韜主張傳教書冊的寫作應該文質並重，不能只顧平順易懂，而忽略辭藻格律，這樣才能使士大夫傳誦於上，廣大民眾景從於下，事半功倍。其三王韜認為不應動輒非難孔子，耶穌教徒中亦可有仰慕孔子者。凡屬宗教，皆有其奧義，不能強求孔子之道必同於基督之教，應令人各修其道其教，各得其善果。¹⁰

麥都思收到此信後考察了王韜一年時間，發現其言行一致、信心堅定，遂於 1854 年 8 月親自為他施洗，王韜就此正式入教。申請受洗後的王韜基於個人對基督信仰的體認，幫助麥都思改寫、潤色了不少宗教宣傳小冊。而入教信函中關於不祭鬼神、不祀祖先的教理闡發，也大受麥都思歡迎，王韜遂被委命改

⁹ 據學者蘇精查證，《倫敦佈道會華中檔案》（此批檔案藏於倫敦大學亞非研究所）中收錄了麥都思 1853 年 10 月提交的半年工作報告，王韜要求受洗的信函即見於該檔案。詳見蘇精，〈王韜的基督教洗禮〉，收入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年），頁 435-452。

¹⁰ 《倫敦佈道會華中檔案》，轉引於蘇精，〈王韜的基督教洗禮〉，收入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年），頁 435-452，未查看檔案原件。

寫麥氏在南洋傳教時期的舊作《清明掃墓之論》，並擬次年出版。王韜受命後廣泛查引其他基督教宣教作品，將全書分為十二節，增加了原作兩倍的篇幅，並將書名改為《野客問難記》，1854年由墨海書館刊行。除了這部近乎獨立撰作的傳教作品外，王韜接著又完成了近百首中文聖詩的改寫工作，並於1855年以《宗主詩章》的書名出版。

無論是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策略的思考，還是編撰宣教作品的工作實踐，在在顯示傳道讀物在王韜這段生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以往研究由於缺乏直接材料的佐證，此方面的論述大多泛泛而談，隨著原始檔案及王韜這一時期（1853-1858）日記的增訂出版，王韜真實的信仰狀況及其宗教觀的特點隨之得到清晰地展示。以往的一些判斷，比如認為王韜從未有過相對虔誠的基督信仰，王韜始終厭惡傳道工作等，也獲得了重新思考的機會。

據王韜日記來看，從1853年遞交入教申請到1856年麥都思離任回國這段時間內，王韜一直在形式上保持著相對虔誠的基督信仰，這主要表現在王韜比較能夠堅持基督徒式的「聖潔生活方式」：比如讀經、聽道、參加主日敬拜活動等¹¹；而對於友人的入教，王韜也持支持態度，尤其是當「隱谷入教一事」在洋場文人群體中引起齟齬爭論時，王韜還對友黨之偏狹觀點大呼惋惜¹²；當然，王韜此時期積極參與傳道事業也很可說明這一點。

但王韜在他的居停主人麥都思1856年離任回國後，尤其是1857年王韜返鄉養病歸來後，就開始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及傳教活動缺乏熱心了，這很可能與麥都思離任後王韜在身份構建上做出新調整有關。不過，從此王韜自身的宗教觀也開始得到充分自由的發展，並開始形成他獨具特色的宗教觀，而王韜與牧師慕維廉之間的一次討論正好說明這一點。

1858年8月，王韜前去聽慕維廉道，其中慕君講及「獨一真神」入中國後有多種譯名如「耶和華」、「呵羅呵」、「天主」、「上帝」等，王韜聽後便開始自行引申：「是一主而有數名也。今華民最佞佛，寺刹香火遍天下，欲稱天主為真佛，以輓其頹波，而教可廣行矣，然道之興廢，其間自有數存，不系乎名，

¹¹ 舉1855年7月間王韜日記為例，王韜在這一月間每週主日都前往會堂聽道，領聖餐。詳見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59-162。

¹² 此事詳細記於王韜1855年八月十有三日癸卯的日記中，詳見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65。

慕君猶未見及乎此耳！」¹³這從基督宗教信仰的標準來看當然是離經叛道的，但王韜在遞交入教信函時就認為各個宗教皆有其奧義，而其道理多有相通，所以從王韜自身的思考脈絡來看，這樣的建議卻是符合他的宗教觀的。

這番見解王韜是否告知了慕維廉，日記中並未記載，但幾天後，慕維廉又跟王韜談起相似問題，他說：「儒、釋、老三教，流行中土已二千餘年，幾於家喻戶曉，然儒者猶辟釋、老為異端，甚者目為民心之蝨賊。無他，以其各立門戶，趨尚殊異也。其有通人達士，則謂三教實殊塗同歸，大旨總要於明心見性而已。不厚彼而薄此，最為通論。」¹⁴王韜就此評論道「頗有精義，與詆毀儒理、摒棄佛老者迥異」¹⁵，並將其鄭重其事地記載在自己的日記裡，很能表明王韜對上述觀點的認同態度。

王韜此後的宗教觀基本以上述觀點為藍本，即把宗教理解為社會、個人兩個層面，從外部社會的角度來看，各種宗教的教規、儀式、傳道行為是差異、甚至是衝突的；但從內部個人的角度來看，各種宗教對於通人達士而言都是明心見性之學、道同而理一。此後王韜談起宗教每多持論如此，即使在二十餘年後的訪日期間時，王韜依然對宗教問題表態道：「其教外則與吾儒相敵，而內則隱與吾道相消息也。西國無不知有天主、耶穌，遂無不知有孔子。其傳天主、耶穌之道於東南者，即自傳孔子之道於西北也。將見不數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為一家。」¹⁶可見王韜的宗教觀在成型後是長久穩定的。

1.2 《華英通商事略》：反思戰爭的「思想資源」

墨海書館從 1850 年遷至上海山東路麥家圈後，尤其是在當年 7 月代表本《新約全書》印刷完畢後，已經有餘力開展翻譯、印刷西方科技文化書籍的工作。1851 年，慕維廉編譯的《格物窮理問答》出版，該書是墨海書館出版的第一本科技類書籍，從此墨海書館傳教士及其中文助手便開始了介紹西方世俗文

¹³ 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176。

¹⁴ 同上注，頁 180。

¹⁵ 同上。

¹⁶ 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文錄新編》（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頁 123。

明的重要事業。

對於晚清來華傳教士為何熱衷於傳播基督福音之外的西方世俗文明，《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的主編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似乎早有交待：「這份月刊……其目的在於使中國人瞭解我們的技藝、科學以及道義，從而打消他們高傲排外的觀念。……本刊編者更願意採用擺事實的方法，使中國人確信他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¹⁷

而麥都思在南洋傳道時，也深受華人富商抵制、歧視之苦，所以當他來到倫敦會上海站之後，在傳福音之餘，他還有計劃地主持墨海書館的「西學中譯」工作。從 1844 年到 1860 年間，墨海書館印刷出版的 171 種書籍中，介紹西方科學文化類書籍有 33 種，占總數的 20%。這些書籍涵蓋西方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及西方歷史等多個近代知識領域，啟蒙意義不可低估。與此同時，1853 年由倫敦會創刊於香港的中文月刊《遐邇貫珍》，及其停刊後繼而起的、1857 年創刊於上海的中文月刊《六合叢談》，同樣為晚清士人了解西學，認清中外時事積累了大量資訊。可以說，在 1862 年晚清洋務派創立京師同文館之前，傳教士堅持的「西學東傳」工作幾乎是晚清士人獲取世界知識的唯一系統性途徑。

將目光鎖定在本文主角王韜及其所代表的第一代口岸知識分子，他們也正是因為參加了「西學東傳」的翻譯工作才成為了晚清中國通曉西學的先驅性人物，但他們除了接觸自己參與翻譯的西書外，還主動地進出傳教士「知識倉儲」，開展找書、讀書的閱讀實踐，並沿著「回應時變」的學思道路，著重獵取傳教士編譯的西史著作作為「思想資源」。可以說，他們在西學助譯史之外，還都有各自的西學閱讀史。而這些通過閱讀獲知的新鮮知識素材，許多也成為觸發他們思想變遷的重要線索，值得研究者共同關注。

下文從王韜曾經重點閱讀的《華英通商事略》這一文本入手，具體考察它與王韜思想變遷的內在聯繫。

《華英通商事略》是王韜與偉烈亞力合譯的、考察中英貿易關係的專門史著作，並未出版中文單行本，而是在 1857 年分六期逐次刊載於倫敦會上海站主

¹⁷ 詳見《中國叢報》第 4 卷。轉引自戴元光著，《中國傳播思想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5。

辦之中文月刊《六合叢談》¹⁸。該文詳述了中英之間自明朝萬曆年間開始，到鴉片貿易興起這段時間內的通商情況，對於英商與華民衝突所導致的歷次官方交涉，考據甚詳。而該文有兩個突出的敘述特點：首先是其在單次中英交涉事件中，全面展現英商、華官、華商、朝廷、英兵船、東印度公司等各方勢力的利益訴求及其鬥爭角力。其次是該文就「華英貿易」這一事體打開時間維度，歷史地比較了明代中國、清代中國與鄭成功主政時期的台灣對英通商的不同政策，而於明清兩代又細分出萬曆、崇禎、康熙、乾隆等不同年間史事。

該文最引發王韜思考的是它在最後一節述及鴉片戰爭的遠因近事：鴉片貿易興起後，地方之華官因收受英商賄賂，不行粵有司禁令，不受理百姓訴訟，通融包庇英鴉片商；英公局見利廣，不顧清廷禁令，允許商船攜帶武器泛海到多個港口進行鴉片貿易……該文記述到此即戛然而止，但其中所涉清廷與地方官、清廷與英鴉片商及其背後之英公局、英兵船之間的深刻對立，已顯示出鴉片戰爭的某種必然性。

這段具體而微的記述很可能正是支撐王韜重新思考鴉片戰爭起因的重要「思想資源」，因為在 1853 年王韜與李善蘭對鴉片戰爭的起因還作如是觀：「午後同壬叔至玉泉軒啜茗，縱譚天下大計，以為天下之壞始於林少穆焚煙之舉，啓釁邊疆，而又不能臨事決斷，奮翦逆氛，以安海內，迨乎王師敗績，輿屍啓羞，而天下始知中國之無人，外邦亦窺朝廷之虛弱。此粵西賊匪所以陰蓄異謀，肆然無忌也。」¹⁹待到讀畢此書後，王韜在 1859 年口岸知識人之間的一次聚會上卻明白地指出林則徐虎門禁煙事件只是表面因素，其背後存在著中英兩國無法調和的利益衝突：「即無焚煙之舉，亦將別啟釁端，故不得盡為林文忠公咎也。」²⁰

更為重要的是，此書還記載到英國自嘉慶、道光年間以降，面對貿易糾紛屢屢以國家武力為其後盾進行護商行動，這也促使王韜認識到中國所面對的並不僅僅是通商貿易的糾紛，更是中英兩國之間的國力競爭。王韜在這次討論中將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歸結為英國國力的不斷增強：「英自康熙時在粵通商設

¹⁸ 本篇連載於《六合叢談》第 1 卷的第 2、6、7、8、9、10 號，詳見沈國威編著，《六合叢談：附題解·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年），頁 27。

¹⁹ 王韜著，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72。

²⁰ 同上注，頁 291。

立公局，直至嘉慶間，未嘗一得志，蓋其時國中多事，米利堅義民叛於內，法蘭西強鄰逼於外，印度未取，國且中弱，故無暇與中國為患。至道光時，君位已安，民心已固，財富兵強，駸駸自大智謀英杰之士如馬禮遜、義律、羅伯聘輩接踵而至粵，效中國之語言文字，漸有窺伺之心，而大逞其所欲為。」²¹

如果說王韜只是從英國的角度鉤沉其國力漸強的過程，那麼同在此次討論之列的蔣敦復則是用道光十六年間的一次中英直接衝突來證明英國國力之強，及中國國力之弱：「道光十六年已有夷舶至此間（筆者按，即討論者當時所在之上海）矣。泊於吳淞口，三日而後行。官民無如之何也。其船名何夏米，船主麥姓，有粵人為之通事，聲言欲至滬通商。前數日，粵督、閩督皆有文移諭寶山縣云，凡遇此等夷船，決勿令其入口。然夷舶徑抵炮台下，守炮軍士以未奉令，不敢施放，繼雖有示諭捕漁船戶當先報聞、不得交通之語，亦不過具文而已。中國之弱，彼已瞭然。」²²

總言之，鴉片戰爭的背後是國力角逐，而中國在這場國力競爭中明顯處於劣勢，甚至是「積弱不振」的，所以《華英通商事略》中所記之史事對於王韜認清中國在當時世界的現實處境，進而打破傳統思想所建構的、中國處於世界秩序中心的這類「神話」意義重大。

而《華英通商事略》所打開的時間維度，也讓王韜意識到英國昔弱今強很可能有賴其全球通商、累積鉅富，所以王韜廿年以後的《弢園著述總目》中評論道：「英之強，專恃商務，開疆拓土，以商人為先路之導。由五印度而達東南洋諸島，以及通商粵東，皆商人為之主持。」王韜思緒所至，還自然地將其與中國的自強相結合：「今日中國欲制西人而自強，亦莫如由商務始。欲商務之旺，莫如設立商務局始。」²³

由此可見，這時期王韜所掌握的知識信息不僅對他理解鴉片戰爭起因，突破「中國為世界中心」的傳統天下觀大有裨益，而且還為他日後的應變意識、變法言論預備了知識基礎。

²¹ 同上。

²² 同上。

²³ 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文錄新編》（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339。

1.3 《大英國志》：基本政體問題的掙扎抉擇

王韜在「滬上傭書」的十三年間，常就中西時事議題與其他口岸文人把酒縱談，所談話題不少是來自上海英公署及傳教士刊物中的新鮮資訊，但就其問題本身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卻幾乎都難與下面這場討論相匹敵。

這場討論的起因是王韜將其新近的讀書心得告訴蔣敦復：「西國政之大謬者，曰男女並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體也。」²⁴蔣敦復當下如何答覆，王韜未記載，但查看蔣翌年所寫的《英志自序》，幾乎將王韜的這番評論完整地轉述了過去：「君民共主也，政教一體也，男女並嗣也，此三者，英國之綱領也」²⁵，便可知其認可態度。但此時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卻反駁王韜道：「是不然。泰西之政，下悅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攬其權，而乾綱仍弗替焉。商足而國富，先欲與萬民用其利，而財用無不裕焉。故有事則歸議院，而無蒙蔽之虞。……況泰西之善政頗多，苟能效而行之，則國治不難。」²⁶

偉烈亞力稱讚泰西善政的言論在當時的口岸文化語境中並不鮮見，因為從《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中的《全球各國紀略》開始，傳教士就經常以稱許的態度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王韜似乎找到了反對這種主張的理據——「中西異治」，所以他反駁道：「中外異治，庶人之清議難以佐大廷之嘉猷也。……中國所重者，禮義廉恥而已。上增其德，下懋其修，以求復於太古之風耳。奇技淫巧鑿破其天者，擯之不談，亦未可為陋也。」²⁷從王韜針鋒相對的反駁中，可以折射看出當時傳教士刊物中推介先進科技的文章，常以中國不思採用現代機械為陋。

這場討論之所以引發後人廣泛關注，並非因為王韜的這段駁論，事實上他的這段評述在他漫遊歐洲之後便得到了完全改觀；這場討論的重大意義在於它觸發了中西互鑑的新面向，即口岸知識分子已經開始針對中西政體運行的基本

²⁴ 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289。

²⁵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頁2b-6a。

²⁶ 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289。

²⁷ 同上。

理據進行對比。若非借助傳教士「知識倉儲」的擴建與更新，口岸知識分子實在難以窺見泰西政體具體運作之面貌，更無力對泰西國政做總體之歸納。而在當時引起他們新的思考面向的著作就是慕維廉與蔣敦復合譯之英國史著作《大英國志》。

《大英國志》的初版、續刻版分別於 1856、1860 年由墨海書館刊行。全書共分八卷，以朝代為序，將英國自「開國紀原」，下迄「維多利亞紀」1856 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的史事，進行了完整地記述。除去朝代更迭之外，該書還重點考察了英國各個時期的政體演變、制度沿革以及科技文化成就等。王韜對該書的評議是：「自創至今，原本具備，於一邦之制度事實，有所考證」²⁸。其中所謂「制度事實」並非虛指，因為該書開篇凡例，就特別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政體類型：「天下萬國，政分三等：禮樂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賤不治貴。有國者，西語曰恩伯臘（譯：即中國皇帝王之號(Emperor)），如中國、俄羅斯、及今法蘭西等國是也。以王者與民所選擇之人共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有國者，西語曰京（譯：即王(King)，與皇帝有別），泰西諸國間有之，而英則歷代相承，俱從此號。又有無帝、無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數，新舊相代，西語曰伯勒格西敦（譯：即為首者之稱(President)），如今之合眾部（按：即美國）是也。」²⁹

該書除了將英國政體放在三種政體類型的框架下去介紹外，還對英國政體的制度實現「巴力門」（Parliament）制度作了專門介紹：「操君民政教之權者曰巴力門。巴力門，上、下二院，君有舉措，詔上院，上院下下院；民有從違，告下院，下院上上院；國中納賦，必會議乃成。律法定自兩院，君、相不能行一法外事。」³⁰

對英國議會制度作如此詳盡之介紹，該書有首創之功，也正因為該書首次言及「巴力門」權力至大，用人行政、制度法律皆由其定奪，蔣敦復與王韜才得以從中覺察出泰西國政中有著迥異於中國傳統政治規則的「民主傳統」，他們也因此最早經歷了這個基本政體問題的掙扎與抉擇：與中國傳統政治規則迥異

²⁸ 王韜，《瀛壖雜誌·甕牖余談》（長沙：岳麓書社，1988 年），頁 120。

²⁹ 慕維廉，《大英國志·凡例》（上海墨海書館，清咸豐丙辰年初刻本，1856 年），頁 1a-1b。

³⁰ 蔣敦復，〈英志自序〉，《嘯古堂文集》，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 1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年），頁 3b-4a。

之「民主傳統」應否行之於中國？之後百餘年的中國士人都將反復回到蔣敦復、王韜此刻所思索、憂慮的這個問題面前，對其表達自己的迎拒態度，並以此為據組織自己的思想行為，因此這一基本政體問題也被潘光哲命名為「蔣敦復式」問題。³¹

此時的王韜對「蔣敦復式」問題的回答是：君民同治是泰西國政大謬之一，「中外異治，庶人之清議難以佐大廷之嘉猷也」³²。但饒有興味的是，隨著王韜生命道路及讀書經驗的轉易，尤其是在其日後認知渠道更加擴展之後，他得以清楚掌握泰西政治運行的實際情況，竟又對同樣的問題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由此可見，王韜的讀書世界，或放大言之每個人類個體的讀書世界在橫向上都是廣袤無邊的，而在縱向上又都隨時轉易，無時或已，有意探詢者，實需注意恢復其具體脈絡及文化語境，才可接近其真實的學思軌跡。

第二章 早期香港報業與口岸知識分子知識視野的拓展

正當王韜逐漸融入滬上文士群體之時，太平天國勢力也在杭州、蘇州、嘉興等江南地區迅猛發展，大有進逼上海之勢。托足於上海英租界的口岸知識人王韜、李善蘭、蔣敦復等一方面悲嘆百姓的流離失所，另一方面也深切認識到清廷的政治腐敗、朝臣的昧於外情不通時務。所以王韜就冒險在 1862 年化名黃畹，向太平天國的蘇福省民政長官劉肇上書獻策。此書中途被清軍繳獲，王韜就此成了清廷緝拿的要犯。有賴英國駐上海領事（即王韜前雇主麥都思的兒子麥華陀）及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的積極運籌，王韜遂於當年 10 月前往香港避禍。此後王韜一別滬上 22 年，開啟了人生的另一番風景。

王韜來港以後，繼續在倫敦佈道會的香港分會任事，主要負責協助理雅各翻譯包括儒家四書五經在內的《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並在印務所擔任了一些校對工作。1867 年王韜遠赴英國協助理雅各繼續翻譯《中國

³¹ 詳見潘光哲，〈晚清中國士人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創造與轉化——以蔣敦復、王韜為中心〉，《新史學》（二十二卷三期，2011 年 9 月），頁 133。

³² 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289。

經典》，藉此機會得以親歷歐洲，並在英國居留兩年多，後回港。王韜在幫理雅各譯書期間還有意開展自己的學思活動，他因不滿於當時漢語知識界未有一本透徹介紹法國歷史的著作而向法國漢學家儒蓮寫信，希望儒蓮能「出其緒餘，纂成一史，以詔後來」，而自己則「願執鉛槧以從閣下之後」³³。但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是儒蓮並未接受王韜的請求。以此為表徵，王韜原有的獲取西學西知的體制途徑在他更加自主的要求面前展現危機，接下來王韜就要在逐漸摸索之中獨立完成他的法國史著作了。

2.1 從儒蓮到張宗良：合作關係及資訊視野的更換

1870 年，由英返港的王韜已經 41 歲了。此前 20 年他一直在幫助西洋傳教士翻譯傳道書籍、西學書籍以及儒學經典，但正如柯文所言「雖然他為教會雇主的服務對他們有無法估量的價值，但很少有真正可稱之為他自己的東西」³⁴。而等到他立志補充以往「知識倉庫」的空白時，他吸收、接受西學的原有途徑卻暴露出局限。

傳教士「知識倉庫」中的西學書目大多由傳教士選定文本、主導編譯，而口岸知識分子只是負責將文稿進行潤色、加工，使其成為訓雅的古文，是所謂「傭書」。所以，在「傳教士—口岸知識分子」這組合作關係中，傳教士是居於主導地位的。所以，當口岸知識分子產生了自己的求知關切後，能否思有所得，很大程度上依賴西洋傳教士的「指授」。王韜在肯定墨海書館的傳教士艾約瑟時就稱讚其「頗肯指授」³⁵。但並不是所有的求知疑問都能得到滿意的答覆，比如協助傳教士翻譯《西醫略論》、《婦幼新說》的口岸知識分子管嗣復，他有意自行編撰《洋涇浜海市緣始考》及《各國教門進中國表》，但因沒有「博雅好學之西人而問之」，最終「苦無佐證」未能寫成。³⁶因此，王韜與其他口岸知識分

³³ 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文錄新編》（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頁 230。

³⁴ （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71。

³⁵ 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335。

³⁶ 同上注，頁 181。

子都經常感慨：「惜吾輩未識西文，而西人亦不肯盡言耳。」³⁷

而同樣因為不識西文，無法閱讀一手材料，《大英國志》中慕維廉刻意凸顯的神權觀念：「英史尤重教會，國中大政，無事不與教相關，故敘述教務，不容簡略，且天下萬事，皆上帝主之，作史者必首言上帝焉。」³⁸被王韜、蔣敦復當作當時英國的政治現實，並將其總結為泰西國政大謬之一，由此展現其思想觀點受傳教士知識資源形塑的具體邏輯。

總言之，王韜及其所代表的口岸知識分子一方面受惠於傳教士主導開發的「知識倉儲」，而另一方面因為缺乏其他思想來源的參照而容易受其限制。當然，這並不是否認傳教士在中外海通之前、之初甚至更長久時期內對西學的輸入之功；而且也不應該輕率地把傳教士所營造的知識管道歸為「上一代」，而把現代報界雙語人才所營造的知識管道歸結為「下一代」，因為西洋傳教士後來同樣創辦了許多影響深遠的中文日報，其自身同樣進行著代級轉換。但是就王韜的合作譯書經歷而言，他與傳教士的合作關係卻同他與報業雙語精英的合作關係有著顯著差異。

與王韜合譯《普法戰紀》的張宗良（字芝軒）和陳言（字靄廷），都是當時香港報界的雙語人才，二人均畢業於香港聖保羅書院，接受西式教育，早年都曾在香港西文報紙擔任翻譯，陳言還出任過《德臣報》的「副主筆」。在與王韜合作編譯《普法戰紀》時，張宗良正擔任《香港近事編錄》的「主筆」，而陳言則於 1871 年創辦了《香港華字日報》。

據蕭永宏考證，王韜 1870 年從英歸港後，隨即擔任《香港近事編錄》的「主筆」工作。³⁹換言之，王韜之所以同張宗良一起編譯《普法戰紀》，主要是因為二人同為《香港近事編錄》「主筆」，共同選取「普法戰爭」這一時事議題進行供稿。即如王韜所說，「午夜一燈，迅筆暝寫，積同束筍，篇帙遂多，旋張君多散諸日報中」⁴⁰。考其發行轉載的歷史，此處所言「日報」當為《香港近事編錄》，但事實上這份報紙每周三刊印，逢星期一、三、五發行，並非嚴格意義之「日

³⁷ 同上注，頁 313。

³⁸ 慕維廉，《大英國志·凡例》（上海墨海書館，清咸豐丙辰年初刻本，1856 年），頁 1a-1b。

³⁹ 詳見蕭永宏，〈王韜與近代早期香港華文報刊業——《循環日報》創辦緣起考〉，《人文中國學報》（第 19 期），頁 297-344。

⁴⁰ 王韜撰，張宗良口譯，《普法戰紀》（大阪：明治二十年九月大脩館，1877 年），頁二 a-b。

報」。但由王韜的此段描述足可回溯《普法戰紀》的最初寫作情境：它最早是以一篇篇敘說戰爭因果、夾敘夾議的日報時事評論的形式連期刊載於大眾媒體，次年六月才「薈萃貫串，次第前後，削偽去冗，甄繁錄要」⁴¹，交由中華印務局活字版排印，1873年7月以十四卷本刊印出版。後又重版，增補六卷。所以，該書旁生枝節、駁雜繁複卻又入情入理的文體風格實脫胎於報章媒體的特殊刊載環境。

關於《普法戰紀》的具體資訊來源及編纂方法，張宗良在序言中介紹曰：「二人者篝燈編錄，就電報之捷而畧者，以為之綱，郵報之緩而詳者，以為之目，自啓釁以迄盟成，搜羅畢遍，按其次第，譯成一書」⁴²。其中所言「電報」、「郵報」，即當時第二次工業革命後世界先進的電信通訊設備，在在顯示香港作為英國遠東殖民地，接枝自「全球聯通」的實時傳訊網絡，得以共享當時世界最先進電信設備所提供的即時訊息與西文日報郵遞而來的戰情分析。而早期香港報業所形成的國際鏈結的認知系統也被《普法戰紀》融攝入書。

當然，王韜在編撰該書的時候，並非僅僅依賴張宗良對西文日報的口譯，王韜與張宗良之間的合作關係更像是編輯員與翻譯員的合作。除張宗良的口譯外，王韜還大量輯入其他香港報界雙語人才所譯之歐洲時事資料，如何玉群、梅自仙等的譯述，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他們雖未被王韜列入該書作者之列，但應該同享《普法戰紀》的盛名。

更值得關注的是，該書（初版）在編譯的後期，正值陳言致力創辦香港首份中文日報（此處所指日報是每日發行之謂也，為嚴格意義之日報）：1871年先在西文日報《德臣西報》中內設《中外新聞七日報》中文專刊，該刊試行成功後，陳言遂以此為基礎，1872年更名為《香港華文日報》。陳言初創首份中文「日報」期間，對於翻譯介紹歐洲列國的時事新聞不遺餘力，所以《普法戰紀》的十一、二卷，大多取材於該報。總體而言，《普法戰紀》除了對兩國城名、歷史沿革的敘述主要取材於《法國圖志》、《日耳曼國紀》之外，其餘幾乎全賴翻譯的西報消息與王韜的戰事評論撐起主體結構。

綜觀《普法戰紀》的成書過程，實與英國遠東殖民地香港「快速現代化」的報業環境，及香港報界精英致力開拓華文日報業的實踐休戚與共。身處香港的

⁴¹ 同上。

⁴² 同上注，頁一七 a-b。

王韜，透過正在起步階段的香港中文報業，融攝實時呈現的歐洲戰況報導，援用香港報業國際鏈結的認知系統，最終完成了兼具時事報導與歷史敘事的時代名著《普法戰紀》。這不僅在當時中國的開明知識界及整個東亞文化圈造成轟動效應，而且對其自身而言也是對原有認知渠道的大大革新。即時翻譯的海量信息不僅讓王韜「見聞日闢」，更讓王韜找到了在新撞擊出的知識版圖上實現理想的最佳位置——評論人才。王韜在 1874 年得以擔任《循環日報》「主筆」，實賴此段著述、認知的經歷。

2.2 《普法戰紀》、《循環日報》蘊含的新「智識」內容

細查《普法戰紀》的刊載發行歷史可知，王韜、張宗良所合譯之前四卷多在《香港近事編錄》上刊載；其後數卷內容，從 1872 年 9 月開始，被《香港華字日報》以 21 篇之體量，進行了長達一年的連續刊載；幾乎與此同步，1872 年 10 月上海第一大中文報《申報》也開始加入轉載，並進行了長達十一個月的連載，總計長文二十五篇⁴³。

《申報》當時正執上海報界一時之牛耳，有賴其鼓吹挾揚，《普法戰紀》甫一發售，便受到讀者群體的熱烈歡迎，甚至在發行之前便已有抄本流傳：「其書雖未付手民，而抄本流傳，南北殆遍」⁴⁴。不僅顯宦名人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都是該書的愛讀者，而且對其嘉許不已；甚至《申報》在該書發售不及一月便收到了針對全書的書評：「閱之令人識見為之大擴，心志為之舒暢，外國之事，未嘗有如是書可以譯供眾覽者」⁴⁵，此後又有對該書的評論：「用筆之簡古，敘事之變化，幾可與左氏龍門比烈，實屬翻譯西書中之特出者，真可為西史增光，定能傳世於無窮」⁴⁶。

從王韜個人角度而言，他決定「傭書滬上」之前既已存有的補寫西史的理想終於得償所願，很可引為快慰；但是這卻為後人留下一個問題：為何《普法戰

⁴³ 詳見蕭永宏，〈王韜與近代早期香港華文報刊業——《循環日報》創辦緣起考〉，《人文中國學報》（2013 年總第 19 期），頁 297-344。

⁴⁴ 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文錄新編》（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頁 116。

⁴⁵ 《申報》（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頁二。

⁴⁶ 《申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頁一。

紀》能得到《香港華字日報》、《申報》等中文大報的鼎力支持，該書又在哪些方面扣合了時代脈動而引起了開明知識界的熱烈回應？

如果僅從《普法戰紀》的外圍來看，其之所以能連載不衰，首先在於王韜開發的新型態歷史書寫模式非常適合報章媒體的刊載形式，其在行文之際博採中西文日報，又以入情入理、駁雜繁複的史事評論連綴其間，極具日報文章所需的嶄新風格，可以說連載版的《普法戰紀》在「報章體」文學創始階段具有奠基之功。同時，其借助嶄新的認知系統，造成極強的時事傳譯效果，由此帶來的「世界知識」的迅速更新甚至於「新聞化」傾向都是該書得到廣泛好評的基礎。

但是只強調上述特點，彷彿會消解《普法戰紀》自身內容的獨特性。因為上述文體特徵、訊息來源都是連載版《普法戰紀》與其他為數甚夥的日報文章所共有，甚至可以說，該書的時事傳譯效果並不如它直接取材的那些專門報導「中外新聞」的日報文章。《普法戰紀》在內容上的獨特性體現在它不僅進行「時事傳譯」，還關注「文化傳譯」——《普法戰紀》力圖將一個變動中的歐洲具體而微地展現出來：大國間的戰爭角力及勢力的此消彼長，各國政體的變化及其影響，最新軍用技術如飛天球、空中攝影、電報鐵路的運用，最新戰法如「總體戰」的實行及其後果等內容畢集於一書。

王韜之所以力圖展現歐洲的風俗文化，並非全為「獵奇心理」，而主要因其認為：在中西海通以來，中國已與歐洲同聲共氣、命運相係，歐洲所採用的鐵路交通、郵政網絡便捷快速，中國亦須努力普及，與世界接軌；歐洲工業革命後日新月異的機器製造已徹底改變了戰爭的規模與型態，中國亦須趕上此股潮流，跟上國際競爭趨勢，否則必受他國武力霸權的脅迫。即如其所謂：「蓋以普法之戰觀之，天下大勢不極其變，則不能複。將來天下各國，必至舟車之致遠同，槍砲之利用同，兵力之戰勝同，機器之製造同。一切巧術視為常技，而後彼乃無所恃以驕人。混同之機於是乎在。」⁴⁷

可以說，王韜致力傳播歐洲文化的動機即在其突破了「以中土為中心」的傳統天下觀，將歐洲的最新變化與中國的發展方向聯繫起來。他在介紹歐洲先進技術、制度的背後，具有誘導讀者接受先進國家業已普及的技術、制度的複雜底蘊。所以，該書「變法圖強」的思想論說性質也是其展現給讀者的重要精神

⁴⁷ 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文錄新編》（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113。

面相，這層意涵在只注重時事傳播的新聞稿件中多不易得。所以，如果不把「思想性內容」與「知識性內容」作完全割斷式的區分，「變法自強」的思想主張也可以視為王韜為早期中文報業提供的最重要的新知識、或言新「智識」內容。

而這種「論說性」的日報文章在王韜創辦《循環日報》時期發展到一個新高峰。雖然據學者考證，《弢園文錄外編》中的政論文章只有 11 篇可以追溯到《循環日報》時期⁴⁸，而王韜在 1875 年《循環日報》創刊一年後即不再實際擔任「主筆」職務⁴⁹，但是僅就《循環日報》發刊時王韜所擬的《本局日報通啓》、《西國日報之盛》、《日報有裨時政論》等文，即可看出其對評議時政非常用心。這對日報讀者而言，是一種新的閱讀習慣的養成，即在新聞通訊之外，又開始對言論內容屢見不鮮。而對王韜而言，則是他為自己在新的知識空間中找到的最合適位置：雖然無法如報界雙語人才那樣直接翻譯、閱讀西文，但他卻能在即時翻譯的海量信息面前發揮自己的獨特價值，王韜所能作的點評議論、輿論倡導其實正回應了當時報界市場的一時所需。這可以說是王韜在新撞擊出的知識版圖上，找到的最合適也最切時需的新職業。

從王韜之後，口岸知識分子亦不再只擔任教會機構的中文助手，其中不少亦開始進入香港或上海的日報行業，比如廣受關注的口岸知識分子沈毓桂即先後在《申報》、《萬國公報》任編輯工作。而第二代口岸知識分子江南秀才錢徵（王韜的女婿）則主持《申報》編輯部二十餘年；另外，1875 年開始進入《循環日報》，協助王韜辦報、並實際擔任主筆的廣東秀才洪士偉同樣也是自幼受儒家教育，而成年接受西學的典型口岸知識分子。

進入現代報業，是王韜作為先驅者，用個人經驗為第二代口岸知識分子摸索出的全新職業圖景。而這樣的工作經歷，最終也必然為口岸知識分子的認知渠道、知識視野造成全新影響。

第三章 日本「思想資源」的引入與口岸知識分子的迎拒態度

當洪士偉加入了《循環日報》之後，王韜便擺脫了管理方面的報務工作，

⁴⁸ 詳見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78-479。

⁴⁹ 同上注，頁 447。

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整理著述上，此時他傾注最多心血的西史著作就是 1890 年出版的《重訂法國志略》（二十四卷本）。此部史書不僅傾注王韜萬斛心血，還可謂集王韜已有「認知渠道」之大成：其參考的書目既有英美傳教士的私人著述，又有中外報紙的新聞紀事，還有江南製造局編印的《西國近事匯編》等。其中更引人注目的是，王韜在 1879 年訪日之後，還開始關注到日本史家岡千仞所編撰的《法蘭西志》與岡本監輔翻譯的《萬國史記》，並以此為契機嘗試取道日本汲取西方歷史知識。王韜閱讀致知的「知識疆域」再次擴充，不僅為他自身的思想發展帶來全新激盪，同時也證明了口岸知識分子所經歷的思想變遷、知識轉型受到來自多方思想資源的推動，具有相對繁複的多元樣態。

3.1 王韜的「扶桑之遊」及 1870 年代中日思想界的不同水位

隨著《普法戰紀》的東傳，王韜在日本知識界亦受到廣泛矚目，據日本著名的維新思想家中村正直回憶：早在王韜訪日前四、五年，即 1874 至 1875 年，他已在友人重野成齋的書桌上看到過《普法戰紀》一書，當時重野成齋曾對他說：「聞此人有東遊之意，果然，則吾儕之幸也。」⁵⁰而隨著 1878 年 1 月，中國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前往日本就職，中日兩國正式建立自《中日修好條約》（1871 年 8 月）締結以來之密切聯繫，於是對王韜的邀請也就被日本學人正式提上日程。從 1878 年 2 月開始，以栗本鋤雲（日本《郵便報知新聞》主編）和重野成齋（修史局一等編修官）為代表的日本文化界通過官方、民間等多種渠道發出邀請，終於在 1879 年 5 月促成了王韜的「扶桑之遊」。

王韜之所以早有東遊之意，主要因其長期浸染於口岸知識界，對日本的近況聽聞頗多。早在 1859 年王韜「滬上傭書」之時，王韜就從友人管嗣復的信札上得知了日本的消息：「日本國亦能製造火輪船，游駛西洋，偵探各國虛實，舟人都通西洋各國語言文字，其用心可謂周密，將來能與西人抗者，日本

⁵⁰ 王韜著，陳尚凡、任光亮校訂，〈中村正直序〉，《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75。

其一也。」⁵¹間隔數天，美國傳教士恰從日本遊覽歸來，王韜又在日記中記下：「薄暮，米利堅人瑪高溫來言，日本現在已臻極盛，而漸伏衰，其所造舟車器皿，半仿歐洲，而不能別創新法，其國男女不別，禮教蔑如，不逮中國遠矣。」⁵²此後，「變法圖強」和「禮教蔑如」這兩個方面的「日本印象」反覆出現在王韜的日本論述中，一方面肯定日本變法改革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從倫理道德的角度批評日本「平居男女不別，廉恥不勵，東方極結侏離之俗，猶未盡變也」⁵³，其中認為中國禮儀文教遠勝於藩邦日本的傳統「偏見」依舊存在。王韜赴日之前的日本觀顯示出一定的複雜性與矛盾性，這既代表了王韜此時對日本的認知水位，又可能構成其想要親身前往日本一探究竟的內在動機。

王韜到了日本後，隨即在知識界引發轟動效應，「都下名士，爭與先生交。文酒談宴，殆無虛日；山遊水嬉，追從如雲，極一時之盛」⁵⁴。蓋當時正值日本明治維新初起，日本朝野人士一致積極汲取西洋知識，努力變法圖強，走向世界。王韜所作的《普法戰紀》以其親身經歷、最新時報入史，遂成日本知識分子認識世界形勢的途徑之一。從推陳出新、介紹最新世界知識的角度，重野成齋甚至認為《普法戰紀》勝過德川末期曾在日本引發覺醒的《海國圖志》：「默深所著《海國圖志》等書，僕亦嘗再讀之，其憂國之心深矣。然於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龜，於先生所言，不免大相逕庭，竊謂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⁵⁵而且書中對於「世變」的敏銳感知，也非常能扣動當時同樣處於新舊轉型期的日本知識分子的心靈。恰如栗本鋤雲所言：「竊以為該書不獨記行陣之事、交戰之跡，而其中議論能脫出漢人之漏舊，此為珍貴之書。」⁵⁶

但這只是王韜引發轟動的表面原因，因為當時就日本本國西文翻譯之水平、動態把握世界局勢之能力，遠無需依賴中國的西書翻譯。而且從 1854 年

⁵¹ 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265。

⁵² 同上。

⁵³ 王韜，《甕牖雜談》，頁 46。轉引自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徵——王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94。

⁵⁴ 王韜著，陳尚凡、任光亮校訂，〈中村正直序〉，《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75-176。

⁵⁵ 王韜著，陳尚凡、任光亮校訂，〈扶桑遊記卷上〉，《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02。

⁵⁶ 栗本鋤雲，〈王紫詮之來遊〉，日本史籍協會編，《匏庵遺稿》（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 年），頁 392。轉引自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2006 年第 64 期），頁 137。

日本開國通商以迄，德川幕府就迅速將傳統的「蘭學」向「英學」轉移，政府創辦「蕃書調所」培養精通英語的翻譯人才，幕府和各藩均派遣留學生前往英國接受現代西式教育，留學歸來的日本學人所翻譯的西書理論水平尤勝於這部來自中國的西史譯著。

所以《普法戰紀》在當時日本的文化語境中，並不是一本引領風潮的西洋史著作（如其在晚清中國所做的那樣），它之所以在日本知識界引發深刻關注，主要因它是一本「有裨時用」的漢學著作。一批日本漢學家如中村正直、岡千仞等試圖藉此次文化交流強調漢學的實用性，用以抗衡明治初年蔚然成風的「漢學無用論」觀點，並進而嘗試證明東西文化可以融合並存於日本社會。

以王韜訪日的重要發起者之一中村正直為例，他的學思道路就很可證明日本知識分子在明治時期就「東西文化能否並存」的問題產生了怎樣的困惑與分歧。中村正直自幼學習漢學、蘭學，精通英文，1866年通過德川幕府「開成所」的考試，與其他十三位優秀學子一起前往歐洲留學。在他抵達英國之時，王韜亦因協助理雅各譯書抵英，兩位幾乎同時開啟海外生活，但中村正直的目的是留學，而王韜則屬於私人旅行、考察。中村正直在英國留學未滿兩年因德川幕府遭遇危機，遂被召回。回國後從1870年開始翻譯英國作家塞繆爾·斯邁爾斯(Smiles Samuel)的著作《西國立志編》，倡言個人自立及個人主義道德學說。該書在明治初期被許多小學列為教科書，作為啟發學生修身之用，可謂一本啟蒙巨著。後又翻譯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自由之理》，提倡歐美近代價值觀中自由、民權之核心思想，對於日本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權運動影響至深，因此中村正直被盛讚為「文明開化」時代的一位「內部改革家」，以此與「外部改革家」福澤諭吉相並立。

此處所言「內部改革家」，主要因為中村正直對「文明開化」的定義聚焦於個體內在精神的改造，他認為日本欲達到近代化目標，必須首重日本人的個人精神改造，若人民個體品行無法良善、智德無法提升，則國家的體質轉換也無法成功。而傳統的儒家式的道德自覺也正因為有助於提升個體的品行智德被中村正直當作「酌東西之中而劑其平」的重要思想遺產。

但這種聲音在明治初的日本思想界並非主流，更加流行的是西化論思想家福澤諭吉對「文明開化」的定義：他認為「文明開化」代表著文明發展到一個

高級階段。而在當時世界，雖然有多種文化、多個中心，但就其發展的水準而言，只有西方通過宗教改革以來的近代發展達到了「文明」標準，而其他地區或中心，包括日本和中國，則沒有達到這樣的「文明」標準。所以他將世界國家分為三類：文明國家，如歐美等西方先進國家；半開化國家，如日本、中國、土耳其等；野蠻國家，如澳大利亞、非洲等國家。所以更激進的維新派人士不但主張全盤接受「優越」的西方文化，還批判中日兩國的東方傳統文化為「時代錯誤」，要解除「惑溺於古風的束縛」。所以在當時的文化環境中，傳統的漢學、國學教育被當作落後的代表，受到極大衝擊，正如中村正直所感嘆的那樣：「當此時棄漢學如土苴。或有漢學者鬱憤不堪，於不平之餘，入海而致死。……以吾譯《西國立志篇》十部交換善本《佩文韻府》，書肆欣然而有喜色。至佛書則更甚。」⁵⁷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下，1870年代末的日本知識界認識到有必要重新認識當時流行的「漢學無用論」觀點，想要通過邀請王韜訪日，為漢學著作《普法戰紀》圈點的方式來證明「漢學」與時代、與實用並沒有脫節，有著需要繼續發揚的現實意義。這是日本知識界，尤其是日本漢學界如此大費周章地邀請、接待、報導王韜訪日的內在原因，其根植於日本當時自身文化發展的具體脈絡。

3.2 「日本經驗」帶來的多重思想激盪

王韜作扶桑之遊的百廿餘日，東京的兩大日報《郵便報知新聞》、《朝野新聞》紛紛刊載王韜與當地文士唱和交遊的詩文作品；漢文期刊《明治詩文》也「適時」轉載了王韜發表於香港報業的《粵逆崖略》一文；在王韜回港後，《郵便報知新聞》還按先前約定，將王韜訪日期間的漢文日記《扶桑游記》加上日文訓詁出版。東京的讀者通過高密度的日報刊文，不難得知這場文化交流活動的盛況。

「報知新聞社」主編栗本鋤雲熱心約稿、刊載的行動背後很難說沒有提振

⁵⁷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頁144。

日本漢學影響力的實際考量，而王韜除了在該報發表了「入鄉隨俗」式的體驗日本文化的《扶桑遊記》外，還發表了數篇似乎有所回應的重要短文。

這幾篇短文均發表在《郵便報知新聞》，分別是 1879 年 6 月 23 日刊登的《華夷辨》、《智說》，6 月 24 日刊登的《地球圖跋》和 6 月 26 日登載的《讀離騷》。從這幾篇短文的中心內容來看，王韜不可能不了解日本漢學的艱難處境，他很可能正是見及此才起而回應（也可能是受邀回應），傳達了自己關於東西文化及儒學問題的看法。

第一篇《華夷辨》的中心觀點是：「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外，而繫於禮之有無也」，「苟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苟無禮也，華則變為夷。豈可沾沾自喜自大厚己以薄人哉」⁵⁸。王韜此處所言「禮之有無」與福澤諭吉的「文明開化」具有某種共性，都將一種更高階段的「文明」，作為「開化與否／華夷之別」的標準，並以此為戮力追尋的目標。但王韜所設想的「文明」或言「有禮」，很可能仍是返回唐虞三代、聖人教化，後文會詳述此點；而福澤諭吉所倡言的「文明開化」卻籠統地歸給了西方先進國家的文化，所以兩者最終還會在應否「西化」這個問題上產生極大分歧，這也是漢學家與西化論者始終無法相合的一點。但王韜能作此想，表現出儒學並非製造「惑溺」、抑制進步的罪魁禍首，儒學在進入近現代的歷史環境中依然可以是一種促進覺醒的文化。

第二篇文章名為《智說》，中心是「世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德，吾以為德惟一而已，智是也」。接著他闡述「仁」、「義」、「禮」、「信」在離開「智」以後都很容易激進、偏狹，唯有依賴「智」才能「補其失，而救其偏」；並將原有的「仁體智用」的關係解構，大力強調「智」的作用：「智也者，洞徹無垠，物來畢照，虛靈不昧，運用如神。其識足以測宇宙之廣，其見足以燭古今之變，故四者皆賴智相輔而行。」⁵⁹王韜此文將儒學與近代科學精神作出最大限度的融合，顯示其推崇智慧、推崇知識的明確主張，並很可引以證明儒學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有用之學，而非僵化、靜止的「時代錯誤」。

第三篇《地球圖跋》常被研究者用來說明王韜的「大同文化觀」，但知曉了該文誕生於明治初日本的特殊文化語境中，則又為理解該文提出了一個更為確切的角度。《地球圖跋》一文首先講到「大地如球之說」隨利瑪竇入中國而

⁵⁸ 王韜，〈變法自強下〉，《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頁 33。

⁵⁹ 王韜，〈智說〉，《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頁 155。

為人所知，觀看地圖的人「乃知中國九州之外，尚有九州。」此後中國與外部世界又是長久隔絕，直到近時，「舟車之制，至極至精，而遂非洪波之所能限，大陵之所能阻」，這才產生萬國交通、四海為鄰的新時代特點，國人重又開始關心世界各國情勢。但是一經考察便會發現世界上「深山大川，殊方異域，民生其間者異俗，因土之宜，以別其性。其間情偽相感……莫能有以一之。」面對這些形形色色的「差異」，王韜卻強調「綜地球諸國而觀之，雖有今昔盛衰大小之不同」，但是天理相同，「天之理好生而惡殺，人之理厭故而喜新」。接著他又舉出東西文化相通的例子，以其宗教觀言之：「其教外則與吾儒相敵，而內則隱與吾道相消息也。西國人無不知有天主、耶穌，遂無不知有孔子。其傳天主、耶穌之道於東南者，即自傳孔子之道於西北也。」既然天理相同，東西文化又內相消息，所以「將見不數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為一家」。最後，王韜補充道：「今世之覽《地球圖》者，當以是說語之。此之謂善觀《地球圖》者。」⁶⁰表明王韜認為這種觀點應該成為時代共識，否則就是不明世界大勢的不善觀《地球圖》者。王韜此處表達的東西文化內相消息的觀點，是對西化論者將東方文化視為低等文化的反擊。

第四篇短文是《讀離騷》，該文就中日兩國文人都很熟悉的古典文學名篇《離騷》開展賞析：王韜由於自身遭際，每一展卷，常懷寄託身世之感，「淒然隕涕，輒不能終篇，至於廢讀」；「屈原在當日，以宗國孤臣，竭忠盡志以事君，直諫不行，卒至放棄」，時至今日「讀之者無不生忠君愛國之心，憂世忘家之念」⁶¹，在在顯示歷史文化資源所包含的超越時代的永恆價值。

王韜這四篇短文連續發表在《郵便報知新聞》，幾乎每篇都有主編栗本錦雲或漢學家重野成齋的熱心評點，顯示出這一登載活動具有切合日本文化語境的意義面相。而這些文章中的觀點幾乎都是王韜結合訪日體驗作出的全新表述，很可看作王韜承受日本時代文化命題之刺激而產生的全新思想激盪。

當然，上述這些只是王韜與日本漢學界就東西文化問題及儒學問題所達成的某種共識。從王韜回港後的學思活動來看，此次東行所接觸之日本思想資源，實際上對他造成了多層次、多面向的思想刺激，並非只此一端。同樣具有代表

⁶⁰ 王韜，〈地球圖跋〉，《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231-232。

⁶¹ 王韜，〈讀離騷書後〉，《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232。

意義的是，王韜在此次東遊中結識了日本史家岡千仞，回港後便開始以岡千仞刪定的《法蘭西志》為藍本修繕自己的《重訂法國志略》。王韜在每卷之末都會對岡千仞在《法蘭西志》中的評論進行轉錄、刪改或辯駁，兩人思想交鋒折射出的中日知識界各自不同的思考脈絡，很能發人深省。

比如岡千仞在評論《法蘭西志》第三卷時寫道：「余觀九世路易護民權，及四世非立諭國人自由權利，喟然歎曰：歐洲各國所以日趨乎旺盛者，在於此也歟！……蓋歐洲各國法律與漢土同其名而異其實，漢土法律出於法官所制，故為法以張政府威權為主，政府威權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氣日愈凋敝矣。歐洲法律成於國會所定，故其為法以護人民權利為主，人民權利日愈增加，而國家元氣日愈隆盛矣。近世英米雄視宇內，職是之由。嗚呼！一法律也，一為漢土，一為英米，世之論政體得失者，宜鑑于此也。」⁶²

岡千仞此段倡言民權、自由，以是否護民權為標準區分兩種法律，並指出漢土法律會導致國家衰敗，英米法律會促進國家日趨興盛。王韜在引述岡千仞的這段評論時，將其刪改為：「余觀路易護民權，及腓立諭國人有自由權利，喟然歎曰：歐洲各國所以日趨于強盛者，其在斯歟！……蓋歐洲各國法律尚有三代之遺風，不務其名而求其實，夫治國大綱不外兩端：一尊君以臨民，一保民以輔君。君尊民卑，則必以張政府威權為主，政府威權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氣日愈凋喪矣。歐洲有議院、有國會，君民共治，一秉至公，所有法律皆成於國會所定，故其為法以護人民權利為主，人民權利日愈增加，而國家元氣日愈充厚矣。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國家有大事，千萬人之心為一心。近世歐洲列國雄視宇內，職是之由。嗚呼！世之論政體得失者，宜鑑于此也。」⁶³

王韜雖將岡千仞文中的「民權」、「自由」等術語保留，卻未見以此為中心闡述。事實上，王韜並不把歐洲各國創設議會制度的理據歸結為對「個體權利」的保護，而是將其歸結為「尚有三代之遺風」；歐洲因為「尚有三代之遺風」，所以頗有善政：「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國家有大事，千萬人之心為一心」⁶⁴。由此可見，王韜心中理想的政治形態依然是三代之治、聖人教化。而出於對近代觀念如個體權利、自由民權等的隔膜，王韜遂將歐洲的現實政治圖解、附

⁶² 《法蘭西志》，卷三，頁 22b-23b。

⁶³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上海：淞隱廬刻本，1890 年），卷三，頁 28b-29a。

⁶⁴ 同上。

會為「洋三代」。而同時代的日本史家岡千仞則對「民權」、「自由」表示了明確地肯定與倡導，這實際上已是明治初日本的時代共識，如前文所述中村正直在 1870 年翻譯的約翰·密爾的《自由之理》在當時日本思想界引領的風潮正在於普及此類觀念，當時日本自由黨領袖河野廣中評價該書道：「截至目前為止所受教育皆為漢學、國學體系，向來動輒提倡攘夷思想。然今日一夕之間，已知應興起大革新，重視人之自由、權利，自覺以廣泛民意為基礎推行政治，銘感至深，內心已描繪出自由民權信條，此對余之生涯為極重大之轉機。」⁶⁵

王韜因取道日本汲取西洋史知識，遂得以較早接觸近代價值中的「民權」、「自由」等觀念。這些在日本的知識界已經普及的近代價值在當時晚清口岸知識分子的閱讀世界中卻顯得相對陌生，引發了王韜對此進行辯駁、思考。

此外，王韜在《重訂法國志略》第五卷還因承襲日本史家岡本監輔所寫的《萬國史記》，得以最早引入由日本知識界新改造的漢語詞彙「共和」與「革命」。王韜不僅引入了這兩個新的政治學名詞，還在對法國大革命的論述中表達了自己對「共和」與「革命」的恐懼。但需要注意的是，王韜並非站在「絕對君權」的立場上去反對「革命」，他同樣對獨裁君主持否定態度：「蓋先世諸王貴族，擅作威福，抑制民權。物極必反，天道循環，轉以釀民人凌上之風，黨羽日繁，亂益不息」⁶⁶，並強調為避免社會動盪，應該制定憲法，約定君民權限「故欲其國之永安久治，以制國憲定君民權限為第一義也」⁶⁷。

從這一側面又可看出王韜雖未樹立「國民即國家，國家即國民」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但又絕非僵化守舊，其在承受日本資源激盪的情況下，亦積極地作出全新的思考與回應。總言之，口岸知識分子王韜在接觸了日本「思想資源」之後不僅識見隨之開闊，價值觀念也受到明顯衝擊，並因之產生多重的思想激盪，顯示出晚清口岸知識者思想認識的具體變化軌跡。

⁶⁵ 轉引自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2006 年第 64 期），頁 140-141。

⁶⁶ 王韜，〈序言〉，《重訂法國志略》（上海：淞隱廬刻本，1890 年），卷一，頁 1b。

⁶⁷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上海：淞隱廬刻本，1890 年），卷五，頁 33a。

總結

口岸知識分子在進入「通商口岸地區」之前，都接受了正統的儒家仕進教育，苦心鑽研聖賢典籍本是他們主要的讀書活動。但是在「西力東漸」的浪潮衝擊下，他們問學關涉的對象開始變異，各類包含世界知識訊息的「域外叢書」逐漸成為他們讀書生活的重要一環。據本文梳理，在口岸知識分子讀書世界變化轉易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知識管道」主要有三：一即西洋傳教士為傳教營造的蘊含西方歷史及近代發展成果信息的「知識倉儲」，其中傳道書籍、中西交涉史書籍、西方歷史書籍對口岸知識分子的思想觀點造成直接的影響作用。二為早期中文日報業，尤其是香港、上海兩地 1870 年代的中文日報業，其大力翻譯西文日報時事訊息的實踐，開拓了口岸知識分子的資訊視野。士人讀報之際，足可掌握動態的世界資訊及全新的言論主張，其引發的多樣思考想像不容忽視，當然中文日報行業也為口岸知識分子提供了另外一個新的職業願景。三為日本「思想資源」，王韜取道日本汲取西方史學知識，遂得以較早接觸「民權」、「自由」等近代價值觀念，日譯書閱讀過程中發生的近代價值與口岸知識者原有觀念的對話衝突，預示了日本「思想資源」將會成為導致中國思想界變遷的一個重要潛在動力來源。

同樣無法忽略的是，雖然口岸知識分子在「通商口岸地區」生活日久，卻並未因此廢止對古史舊籍、傳統經典的閱讀，「新知識」與「舊知識」在很大程度上交叉並存於口岸知識分子的閱讀世界。以王韜為例，他「傭書滬上」期間，依然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其對八股帖括的學習閱讀自不待言。口岸知識分子有著新、舊知識的雙重視域，這同樣是他們讀書生活的一個重要現實。本文因聚焦在口岸知識分子讀書世界及認知渠道的拓展過程上，所以無力詳敘此點，補記於此，待諸同好共同開掘探討。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申報》（上海）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慕維廉，《大英國志》，上海：墨海書館清咸豐丙辰年初刻本，1856。

王韜撰，張宗良口譯，《普法戰紀》，大阪：明治二十年九月大脩館，1877。

王韜著，《重訂法國志略》，上海：淞隱廬刻本，1890。

王韜撰，張宗良口譯，《重訂普法戰紀》，香港：中華印務總局，清光緒戊戌年鉛印本，1898。

王韜著，〈弢園尺牘〉，輯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〇〇輯·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王韜著，陳尚凡、任光亮校訂，《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王韜著，《瀛壖雜誌·甕牖余談》，長沙：岳麓書社，1988。

王韜著，《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王韜著，李天綱編校，《弢園文錄新編》，上海：中西書局，2012。

王韜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

二、近人論著

黨月異，《王韜與中國近代文學的轉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段懷清，《傳教士與晚清口岸文人》，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7。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 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49-1908》，臺北：麥田出版，2009。
- 李穀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李長莉，〈晚清上海的新知識空間〉，《學術月刊》（2006年10月號），頁144-151。
- 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 （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 潘光哲，〈晚清士人對英國政治制度的認識(1830-185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00年第17期），頁147-196。
- 潘光哲，〈晚清中國士人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創造與轉化——以蔣敦復、王韜為中心〉，《新史學》（二十二卷三期，2011年9月），頁113-159。
-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 1833-189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 （日）沈國威編著，《六合叢談：附題解·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 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徵——王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2003年，12卷32期），頁192-236。
-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 魏外揚，《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來華宣教士列傳》，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
- 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 蕭永宏，〈王韜與近代早期香港華文報刊業——《循環日報》創辦緣起考〉，《人文中國學報》（2013年總第19期），頁297-344。

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2006 年第 64 期），頁 140-141。

徐興慶，〈王韜的日本經驗及其思想變遷〉，收入徐興慶、陳明姿編：《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域・遷移》，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164 - 169。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收入丁日初主編，《近代中國》，第 12 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168-244。

易惠莉，〈同光年間上海本邑紳士的生活價值取向——以張燠綸為主要考察對象（上）〉，《歷史教學問題》（2005 年第 3 期），頁 7-17。

易惠莉，〈同光年間上海本邑紳士的生活價值取向——以張燠綸為主要考察對象（下）〉，《歷史教學問題》（2005 年第 4 期），頁 4-8。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張志春，《王韜年譜》，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 1815 至 1900 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